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 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符海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 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符海朝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 符海朝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161 - 8319 - 9

I. ①辽… II. ①符… III. ①汉族—民族心理—研究—中国—辽宋金元时代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401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25
插 页 2
字 数 395 千字
定 价 80.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方儒士们对史天泽的赞美之辞也影响到
了《元史》的编撰者，~~元史~~《元史·史天泽传》
最后的评论性文字是：“出入将相五十年，上不
疑而人不怨，人以比於鄧子仪、曹彬云。”^①

如果说上述材料反映的是北方儒士们对史
天泽的赞美之词的话，那么，下面王恽的一首诗
则反映了北方儒士的急于报恩之情。

上史丞相^②

百揆端归一相尊，

中台潜隐北溪鲲。

人间桃李争晴画，

天上风云拥戟门。

鸢鹭遇知恩一顾，

家山回首惜空尊。

幸蒙翦拂长鸣去，

会有文章报至恩。

除了对史天泽的赞美之词和知遇之恩外，
北方儒士们对史氏家族的其它重要人物也有
类似之情。

史楫，公之纯正莅官严恪，荣戚左右罔敢

众推为上将之材，自任以天下之重。攀鳞附凤，
 早依日月之光；捧毂推轮，荣受干戈之命。萃
 一门之忠孝，兼五路之侯封。终始四朝，险夷
 一节。仁温温乎冬日，气凛凛乎秋霜。内蕴一
 诚，外含万^事。推而行阵，则勇摧大敌；敛而
 康济，则泽被生民。顾所遇之如何，必其才之
 相应。鹰扬虎视，收中原百战之熏；兰婉芝芳，
 竊汉将千金之誉。既备过人之智，故多及物之
 功。绥斯来，重斯和；存者神，过者化。红莲
 绿水，尽惜筹入幕之宾；长剑危冠，皆扛鼎蒙
 轮之士。谓奴穴尚干於天讨，诏龙骧暂驻於遐
 馭。旌旗未指於淮甯，草水先声於江左。虚怀
 下士，宜平原宾客之三千；不战屈人，切充国
 便宜之十二。虽闲暇不忘於武备，一周旋悉本
 乎儒风。诗书鞍马之间，谈笑风尘之外。又且
 脱屣示耻，在人所难。当诸郎胜事之初，乃一
 旦奉身而避。弃壁而负其材，林回虽近於人情；
 舍己而与诸人，季札盖存乎教典。方庆悬车之
 乐，复承顾命之荣。秉驥馵而超天河，以腹心
 而操庙算。增辉白日，叶赞明时，力障群阴，

20×20=400

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

作者手迹（二）

序 言

与符海朝先生相识积年。在我的印象中，依他的年龄层次，能够兼治辽宋金元史，肯定是凤毛麟角者。他说话有时相当风趣和幽默，其实还是反映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认识。

我不懂心理史学，但符海朝先生能纵贯辽金元代近五百年间，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作了有相当难度和深度的研究，写出自己的心得，肯定是件推进史学发展的好事。全书文字相当顺畅，读来竟不觉得累，有点读小说的感觉，这说明符海朝先生对此问题别具匠心，认真地下了功夫，有些论述，反映了他的深入而独到的见解。

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矛盾、融合等，当然是人类史上的一大研究课题。在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民族之间矛盾、冲突、仇杀等是势不可免的，这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正确阐述；但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中，由于汉族处较高的经济和文化水平，各民族之间的友好、通婚和融合，互相取长补短，也是势不可免的。史家的任务，就是忠于史实，客观而公正地论述。漆侠先生说，“只有在正确的民族观的认识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契丹、党项和女真诸族及其建立的国家”。“对于契丹等族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只要是有益于中华民族发展的活动和创造，都应当予以肯定和称赞。同样地，对契丹等族活动中消极的甚至反动的方面，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有害的或阻碍的作用，也都应给以批判和否定。评价契丹诸族及其国家政权，同评价汉族及其国家政权，用的是一个标准和一个尺度，这个标准和尺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①

^①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绪论，《漆侠全集》第5卷第，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2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符海朝先生论析辽金元代的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正是贯彻了这个原则。他说：“今日的史学专著和史学教科书，写到民族融合问题时，语调大多很平淡，阅读者自然也难以体验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其实，汉文化当时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最恰当的描述是‘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他形容汉族士人的心态，使用了“‘陆沉’心理”、“对文明之殇的焦虑”、“载体之殇”、“汉文化面临覆灭之祸”、“艰难的心理转换”等，都是对历史真实十分准确而深刻的把握。当然，也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这条历史规律经过惨痛的磨合，终究还是起着永恒的作用。

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唯物主义真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在同样或相似的存在下，人们的意识竟是千姿百态的。符海朝先生尽可能地爬梳残存的史料，对此五百年间的北方汉族上层各种复杂心理，确是作了相当全面的、尽可能深入的描述，为前所未见，应当说是本书的重要创新。给我印象尤深者，是对处于辽、宋、金三朝势力角逐之下，燕地汉族上层各种复杂心理的综合和归纳。

衷心祝符海朝先生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王曾瑜

2014年10月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五代时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20)
第一节 传统汉人王朝时期	(21)
第二节 沙陀三王朝时期	(31)
第二章 辽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77)
第一节 汉人上层的来源及契丹贵族对他们的心理安慰	(77)
第二节 辽朝初、中期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90)
第三章 辽、宋、金鼎革时期“燕人”和渤海人上层的 民族心理	(126)
第一节 幽、云地区的地理态势和历史文化生态	(126)
第二节 “燕人”名称的由来和演变	(133)
第三节 辽、宋、金之交燕人和渤海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140)
第四章 金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183)
第一节 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短时段因素	(184)
第二节 汉儿和南人臣僚之间的斗争	(203)
第三节 忠诚还是背叛——原宋境内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213)
第四节 金世宗“诡随”心理理论分析与评价	(227)
第五节 隐逸、愤世嫉俗与玩世不恭心理	(243)

2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第五章 元代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254)
第一节 金末元初的复杂心理	(254)
第二节 正统心理的若干角度分析	(265)
第三节 谣言、设纬与元代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	(278)
第四节 北方汉人上层的“夷夏观”分析	(312)
结 论	(342)
参考文献	(349)
后 记	(363)

绪 论

一 课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辽、金、元三朝，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在少数民族执掌国家核心权力的近五百年时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辽国一度将其势力扩展到黄河流域；金国则在灭亡北宋之后，对南宋政权穷追不舍，海陵王时期，更希图用战争手段统一中国；而蒙古人最终主导了国家新的统一，但是统一之后，维系统一的时间却较为短暂。如果站在统一国家所需要的共同社会心理形成过程的角度来分析此时期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非常有利于对此时期历史的整体的研究，对解决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也有历史的借鉴价值。

之所以以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为研究视角，是因为在王朝更替时期，“人心之所以为楚为汉者，皆倚之以为重”^①，尤其是其中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他们在历史关键时期的心态和选择，常常对社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因为在农业社会，集体无意识的盲目跟风心态很有市场。且在少数民族主导建立的王朝中，能够和少数民族的皇帝和各级掌权人物有实质性的接触机会的，正是这些以官僚、宗教领袖和士人身份出面的汉人上层人物^②，他们的感受，虽说不能代表所有汉人的感受，但还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从外族入侵

① 苏天爵辑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史略》卷六《万户严武惠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5页。

② 屈文军指出：“乡下甚至县一级的城市，普通的汉人百姓也许一辈子都难得遇到一个统治民族的成员；即使是金朝，女真人大量分散居于汉地，一般汉人还是很少接触到他们。”见氏著《辽西夏金元史十五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6页。

2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中,深深感受到个人的痛苦”^①,无数个个体共同的痛苦,也就是该族群的痛苦。

而我们对该时期该群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还很不够,导致我们对该段历史的研究,深度还是不够^②。个中缘由,固然有史料缺乏方面的因素,但和史学界的投入少也有关系,其实,如果我们投入的人力和精力再多一些,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再合理一些,对史料的解读再深刻一些,通过对该群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官僚、文人抑或二者兼备的人的行为、语言及其留下的作品进行深度分析,可以考察其“外显现象背后的‘欲望’的复杂、矛盾状态”^③,也即其民族心理及其他社会心理。

有鉴于此,我们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心理史学的相关理论及方法,并结合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④以及史学研究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对此阶段北方汉人上层的民族心理,作一番尝试性的研究,期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尝试,对本时段历史研究的深度和整体研究,起到一些引领作用。

二 概念的界定

由于该时期处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因此对于汉人概念的界定,要复杂得多,不得不进行长时段的线索的梳理。

(一) 汉民族形成史的简要考察

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之后,便开始叫汉族”^⑤,他说的华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吕思勉先

① [德] 傅海波、[英] 崔瑞德主编,史为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② 萧启庆先生在《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义与统合》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世前期史研究有一个严重的缺憾,即是南北两方现存史料与相关研究之多寡非常不平衡。有关辽、金两代及元代北方的史籍、文集、方志远少于南方,以致研究北方区域历史者往往因资料缺乏而裹足不前。”在该文中,萧氏又引用了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教授的话来强调该问题,“一般用宋、元时代这种区分,但严密地说,这也有北宋—金—元与北宋—南宋—元的两个潮流,也就是说有北流与南流,对于各演变的不同,以及王朝交替导致的流向之变化,也因金、元统治下的社会不明之故,而不能贯通”。见萧氏《元代族群文化与科举》一书正文,(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3页。

③ 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④ 该理论认为长时段主要是结构,中时段主要是局势,短时段主要是事件。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三个时段的研究方法都将使用,但是主要运用中时段和短时段结合的研究方法。

⑤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第19页。

生在《先秦史》中说：“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① 朱绍侯先生则认为“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谓，是由‘汉国’而来的”^②；许倬云先生认为“汉人的名称从汉朝而来”^③。以上四说虽有些时间差异，但他们都认为汉族之名源于刘邦创立的汉国或汉朝。费孝通先生则指出：“民族的得名必须先有民族实体的存在，并不是得了名才成为一个民族实体的。”^④ 据此规律，他认定汉族形成于秦汉时代。但是，关于汉人这一称呼的广泛流行，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秦汉以后，“有人说：汉人成为族称起于南北朝初期，可能是符合事实的，因为魏晋之后正是北方诸族纷纷入主中原的十六国分裂时期，也正是汉人和非汉诸族接触和混杂的时候。汉人这个名称也成了当时流行的指中原原有居民的称呼了”^⑤。因为“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是从‘他称’转为‘自称’”^⑥，笔者认为此观点可以略作补充，民族名称的一般规律就像人的姓名一样，先有“自称”，然后先在自我圈内获得认可并开始流行，随后在自我圈外获得认可并扩大流行的范围，最终为圈内外广泛认可。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北方汉人和非汉人接触非常频繁的时期，汉人这一称呼，在从“自称”转为广泛的“他称”的过程中，又不断强化了汉人的自我族群认同意识。

今天的汉族，历史上称作“汉儿”或“汉人”。汉人的前身是三代的华夏族群，而华夏族群的产生要追溯到远古文化时期，族群出现之后，相互之间以各种方式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产生共同的文化。

秦统一之后，南凿灵渠伐百越，北修长城御匈奴，虽然是南北殊途，但是民族融合的步伐，南北方都在加快。两汉时期，华夏族群与南方、东南方、西南方的族群融合，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也即今人所说的汉族。汉族已不再是一个族群，而是演变为一个民族，发生了质的变化。

说秦汉时的汉族已是一个民族，其理论依据是当代学者普遍认同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共同体，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虽然在各个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体中，其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② 朱绍侯：《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文史知识》1984年第11期。

③ 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④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3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

4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规模、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它们都具有最一般的共同特征，即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人们共同体。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则是最主要的特征，缺此，便不称其为民族了”^①。

春秋时，中原齐、鲁、晋三国与西部的秦国、南方的楚国，在语言上已经基本趋同，但与吴、越地区的语言差异还很大，所以当时的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器物与事物的对译记载，而散居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戎狄，与华夏族群的语言差异，更为明显，《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南戎人首领驹支云：“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贄币不通，语言不达。”^② 文化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

秦统一以后，统一了文字，便利了交流。各地皆由朝廷直接设官治理，汉语成了朝廷治理地方的通用语言，发布行政命令、举办教育以及诉讼断案，皆使用统一的文字和统一的语言。两汉时期，解释文字的书籍《尔雅》和《说文解字》，也由朝廷颁布通行，打破了方言对汉语传播的限制，为汉字及汉语的发展及传播建立了理论体系，更有利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文化交流及全面发展。

共同的农耕经济生产方式，导致汉族人逐渐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重血缘、地缘，重礼尚往来，婚、丧、嫁、娶皆有表示情感的比较复杂的礼仪方式，政治上崇尚德治辅以法治，法律中也渗透着浓厚的人情色彩。

而共同的民族意识也在与周边民族的交往中逐渐形成。其含义包括与外族的交往（包括冲突）中逐渐形成的文化观念体系，而同族自我认同意识是民族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梁启超先生曾经对此做过形象的解释，“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③。秦汉疆域内的人民都认同为“中国人”，形成了诸夏亲昵的同胞关系准则，遇荒则互相救恤，遇侵则合力共击；对外族，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心理提防并予以抵抗，但对已经接受汉族礼乐文化的周边民族，又以“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开阔胸怀予以接纳。

① 杨坤：《民族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页。

② 顾宝田：《左氏春秋译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0页。

③ 梁启超：《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43页。

由此看来,汉族在秦汉时已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和共同民族意识的共同体。但是,秦汉时汉族虽已形成,但在习惯上还是称“中国人”。魏晋南北朝时,“五胡”进入中原,也自认是“中国人”,但是由于胡汉之间的文化差异还很大,于是“汉人”和“胡人”的族群区分很明显,《北齐书·高德政传》记载:“高德政常言宜用汉,除鲜卑,此即合死。”^①以“汉人”对“胡人”中的鲜卑人,显见族群界限还很分明。汉人成为族称,则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二) 概念的界定

20世纪50年代,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热潮,提出了许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成为1949年以来大陆学术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起源于苏联学者格叶菲莫夫于1952年在列宁格勒国立日丹诺夫大学举行的科学会议上的报告,格氏曾于1952年访问过中国,报告中的一些观点,曾经和中国许多历史学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②。格氏认为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民族只是处于部族阶段。针对该文的观点,范文澜先生发表了《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期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明显背离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引发了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大讨论。受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双重影响,在该讨论中,范文澜一方的观点,处于明显的劣势^③。囿于斯大林民族定义概念的框框,在意识形态严重扭曲学术研究的时代,和范文澜一方的观点比较起来,许多学者的观点只能是注释学。

改革开放之后,范文澜先生的观点方得到普遍认可,并逐渐引发了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入的汉民族历史研究热潮,包括对汉民族起源、发展过程、族称、文化、语言等众多方面课题的探讨。其标志性成果是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及《汉民族发展史》二书^④。

① 李百药:《北齐书》卷三〇,《高德政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② 该文原载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0期,后登载于中国《民族问题译丛》1954年第2辑。

③ 关于该讨论的总体概况,可以参考《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订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④ 徐杰舜:《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汉民族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 辽金元时期北方汉人上层民族心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逐渐解放,学界“开始对斯大林定义进行修正、批判直至抛弃,试着给民族做出新的定义,提出各种各样的看法”^①。但是,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定义所做出的新解释,才为国内学界和政界广泛接受,其定义如下:“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民族定义,概括吸收了不同历史时期民族定义研究的学术成果,是学术智慧的结晶,使民族定义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民族定义虽然达成共识,但对有悠久历史且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汉民族历史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在许多国人的意识中,一提民族研究,几乎等于搞少数民族问题研究。汉民族为什么会形成如此大的一个民族,牵涉的问题很多,研究意义也很大,其中适合当今中国民族国情且能被上下层均认可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的民族政策调整提供正确的理论支撑,因此,这方面课题的研究,还需要许多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

由于本课题的时间段正好处于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而该时期汉人的外延又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以概念的界定,颇为复杂。在作了长时期的思考后,决定采用文化标准和族群识别相结合的方法。从文化角度分析,界定汉人的标准,基本上遵循牟复礼、许倬云和马戎等先生的理论,“对于汉人来说,这个词本身指的是整个汉文化共同体或汉民族共同体”^③;“汉人不是一个族群的意义,而是一种文化群的意义”^④;“构成汉人最重要的基础,并不是体质特征和血缘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层面的同化”^⑤。因此,本课题也将辽、金时期的渤海人上层,列为研究对象。同时,还要密切注意该时期族群的识别意识还是比较明晰的,从后唐明宗、金世宗、忽必烈、耶律楚材等的系列言行均可看出。只

① 李振宏、刘克辉:《民族历史与现代观念——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导论部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②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③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633页。

④ 《观世变》,第223页。

⑤ 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有通过这种双重角度的分析,方能对课题有深入和全面的研究^①。

辽以及和辽并存的五代和北宋时期,汉人的范围,除了长城一线以南的传统汉人生活区的汉人外,还包括辽末已经汉化的渤海人。金朝时期则包括金世宗常说的“燕人”和“南人”,元朝时期则包括金代的汉人和已经汉化的契丹人、女真人,以及其他数量较少且同样已经汉化的少数民族。

辽国国号经历过多次的变革^②,为了叙述的方便,也是为了不引起读者的误解,作为国家政权解释时,一律称呼为“辽”,作为民族解释时,一律称呼为契丹族。元代历史包括大蒙古国和元朝两个阶段的历史。

本课题所界定的北方,主要包括今天的京、津、冀、鲁、豫、晋等省市的全部以及陕、苏、皖三省的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区。这种划分应该接近萧启庆先生研究该段历史时期的南、北方历史分界线,也接近竺沙雅章教授的南流、北流历史分界线。

汉人上层则包括其所涵盖的所有阶层,课题中则视历史环境和语境的需要,分别使用汉人地主、汉人臣僚、汉人儒士(文人)、汉军将领等称呼,称呼虽有不同,但没有概念上的差异。当然,汉人上层作为一政治群体,并非一固定的社会阶层,既有在王朝鼎革时期“大洗牌、大组合”的必然性变动,也有基于偶然性因素的变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既要有静态的分析,又要有动态的探讨。

民族心理则仅限于在少数民族掌握政权核心部分的背景下,基于此所产生的一种始终在制造、变动但又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精神流动体。

三 心理学理论的选择与应用

心理学理论的恰当使用,同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难题,既不能空泛地议论,又不能作无端的猜测,水乳交融的分析境界,方是严谨的研究者追求的目标。在经过无数次的苦苦思索及听取王曾瑜、程民生、王善军等本时段研究大家的建议后,决定采用民族心理学、情绪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称谓社会学等心理学理论作为研究中使用较多的

① 以耶律楚材为例,从文化角度分析,耶律楚材可以称为汉人,但是他还是不断显露出其作为契丹贵族后裔的族群意识。

② 参见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理论和研究方法。

长时段因素指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过程而逐渐形成且有相对稳定性的并为后代逐渐传承的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深层次因素，也即我们在本课题中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的运用，该理论将和群体心理学的集体无意识理论^①结合起来，用于分析辽朝建国以前，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向华北乃至中原地区扩张，取代中原地区汉民族政权的过程中，利用汉人上层（包括其前身华夏族）势力的悠久历史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诚如马戎教授所言：“民族集团之间历史上关系的影响，或称为历史因素。民族间过去是否长期融洽或争战，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员的交往方面是什么情况，会影响现今的民族关系。”^②而集体无意识理论复将与传播心理学结合起来，研究元代谣言、讖纬所反映的民族心理的复杂与变动。

辽金元三朝，作为掌握国家核心权力的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统治阶层，对汉人的族群意识方面都存在程度不同、时间长短不同的偏见和歧视，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Goron）在分析种族—族群关系时将其作为两个变量提出，他认为“偏见主要表现于人们的意识层次，歧视则表现于人们对待其他族群成员的行为当中，特别是表现在掌权族群所制定的歧视其他一切族群的法律和规定之中”^③，笔者将该理论和年鉴学派的时段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认为这是短时段因素中影响汉人上层民族心理变化的非常重要的消极性因素。在分析金世宗的“燕人诡随”评价问题时，也将使用该理论分析其动机，“金朝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民族政策中的歧视、压迫色彩势所难免，但在历代皇帝中像金世宗那样把对本民族以外的民族的猜忌、防范乃至仇视赤裸裸的形之于言表尚不多见”^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保持本族群对资源的垄断。

而在分析辽代卢文进、张希崇、张砺、李澣等汉人上层来到辽国后又南逃的问题时，将使用情绪心理学的“分别焦虑”理论，农耕民族安土重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会加重这种分别焦虑行为。在分析韩德让等特

① 主要参考法国知名社会心理学家、群体心理学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的名著《乌合之众》一书。

② 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③ 马戎：《民族社会学》，第84页。

④ 王德忠：《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